

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纪要

韦 维

由武汉大学和台湾东海大学联合举办的“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于1995年8月29日至9月2日在武大举行。

徐复观先生是湖北省浠水县人，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先后在浠水、武昌、日本求学，30、40年代曾投身军旅，任职政界，后在熊十力先生的教诲和启发下，转向学术研究，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举办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武汉大学和东海大学，虽然分别位于海峡两岸，但有一个共同点：这两所大学都是徐复观生前活动过的地方。1938年，徐复观作为一名抗日军人，从前线来到珞珈山参加军官集训。1955年东海大学创建后，徐复观就在该校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正如陶德麟校长在讨论会开幕词中所说：“我们两校联合举办这次学术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而我们共同纪念徐复观先生的目的，就是要继承和弘扬徐先生的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实现徐先生所期望的一个民主、繁荣、统一的中国，而尽我们的努力。”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在中国大陆首次举行的研究徐复观思想的专题学术讨论会。5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出席了会议，对徐复观的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文化思想、政治哲学、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对徐复观学术成就的文化地理环境与时代意义，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集中代表了当前徐复观思想研究的新成果新水平。

关于徐复观作为思想家的历史定位，是会议探讨的一个重点。萧萐父（武汉大学）指出：徐复观是当代中国独立不苟的思想家。由于他一生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西学与中学之间、儒家与道论之间、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所以他的思想特别丰富。他总是采取一种双向扬弃的方法，而不是偏向哪一边。因此，我们看到徐先生的著作，既有左右开弓的地方，又有左右逢源的地方。他总是在两极对立之中保持一定的张力，在双向扬弃中求得思想的前进。他的学术思想总方向是：一方面反思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大力发扬中国文化。他总是努力洗涤掉民族文化中阴暗、污秽、僵化的东西，发扬它的真精神。杜维明（哈佛大学）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认为，徐复观与唐君毅、牟宗三不同，对儒家的实践理性和沟通理性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徐先生关怀政治，投身社会，究心人文，凸显礼乐教化，而特别到晚年复归孔子，植根《论语》。他对形而上学的纯粹冥思不重视，认为研究中国文化必须在工夫、体验、实践上下手。这并不是抹煞思辨的意义，而是认为思辨必须要以工夫、体验、实践为基础，否则思辨只是空想。徐先生的思想在现代新儒学发展文化视野中最有光辉的价值之一，是为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知识分子开辟了深厚的意义空间和广阔的公众领域。

如何评价徐复观的哲学思想，是这次会议的又一重点，王煜（香港中文大学）认为，徐复观的气质在文史哲之间。他的哲学成就远逊于唐君毅、牟宗三，而特色在考据训诂、偏重美学。刘纲纪（武汉大学）则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哲学与美学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相互游离的状态。如果我们要去找一位专门研究哲学，同时又致力于艺术与美学问题的研究，并写下了系统的著作的学者，那就可以说只有徐复观一人了。

徐复观从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人性论的角度系统分析了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并把这种分析应用于对历代中国文艺理论、特别是对中国画论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对美学问题的不少重要看法。他是一位在美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的哲学家。李维武（武汉大学）指出：徐复观不仅是一位思想史家，而且也是一位哲学家。他对于 20 世纪中国哲学三大思潮——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作了相当关键的提问。他认为，哲学属于价值世界而不属于科学世界，因此哲学不能象科学主义思潮所主张的那样，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他又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两类形而上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方面不同意象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形式讲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不同意以现代新儒学为主流的人文主义思潮重建本体论的思路，认为建立形而上学并不能真正体现中国人文精神，而主张消解形而上学。徐复观的这些提问，提出了 20 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创造。姜国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门就徐复观心性论的特点作了探讨，认为中国历代儒家学者，议论“心”、“性”都紧联着“天”，强调“尽心、知性、知天”和“究天人之际”，达到“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合德”的最高境界。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都沿着其先行者的思想路径前进，而追求“人”的“形而上”的意义。徐复观则不然，他论“心”说“性”，并不紧联着“天”、“天道”，不在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合德”的思维模式中求“尽心、知性、知天”，而是以自己的“从上向下落，从外向内收”的思维路径，来追求“人心”、“人性”的价值。他不从“天”来体认“心”，而从人的生理构造、人生价值的根源上去认识“心”，这就更具有笃实的价值和实在的意义。

徐复观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受到不少与会学者的关注，引起了广泛的探讨。郭齐勇（武汉大学）认为，以中国精英文化主体的忧患意识、忧患人生及其对文化制品的积淀、贯注为视角，整理中国思想史，是徐复观的一大发明、一大贡献。徐氏思想史的研究，指导性的乃是一道德史观或心性史观。他对道德形而上学也是非常关注的，只是他没有从哲学家的角度，而是从思想史家的角度来体察而已。他对孔子“性与天道”的阐释，关于道德的超验性、普遍性、永恒性及个体内在人格世界中无限的道德要求及其在现世的完成，关于生命主体的无限超越性及“天”的要求如何转成主体之“性”的要求，关于孔子仁学何以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似都不能只看成徐氏的“客观”评述。以心性史观来建构思想史是未能自圆的，它可能造成诸多的盲点。黄俊杰（台湾大学）所提交的论文指出：徐复观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主要是由“整体论的方法”与“比较的观点”所构成。“整体论的方法”又可细分为“发展的整体论”和“结构的整体论”。在这种整体论的方法学之下，徐复观常常将他所研究的对象看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认为要掌握思想或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思想或观念放在广袤的时空脉络中加以考量。这在徐先生的论著中表现为两种具体操作方式：（一）将儒家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探讨儒家思想与当时社会互动之状况；（二）将儒家思想放在徐复观所处的时代脉络中加以衡量，赋古典以新义，出新解于陈编。经由这两种实际的操作方法，徐复观笔下的儒家论述绝不是束诸高阁的高文典册，儒家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逸士；相反地，儒家经典乃深深浸润在时代脉络之中的典籍，而儒家思想家也成为为苦难人民伸张正义的斗士。颜炳罡（山东大学）指出，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对研究方法的看法大体相同，如他们都承认中国文化是活的生命之存在，都反对将活历史看成是死材料的研究，但他们也存在微异，似乎徐复观侧重中国传统文化义理原委的会通，唐君毅比较注重超越的反省，而牟宗三则强调生命的证悟，三者正可以相互欣赏和会通。

讨论会期间，徐复观先生长子、东海大学总务长徐武军教授，将徐复观先生的部分手稿及收藏字画捐赠武汉大学，并与武汉大学签定了捐资设立“徐复观奖学金”的协议。